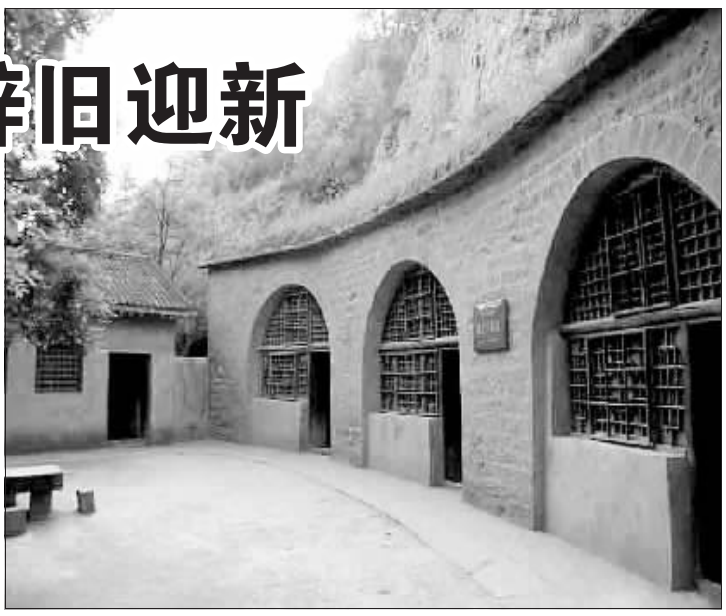


抗战中在杨家岭辞旧迎新

延根 口述 于洋 整理



杨家岭窑洞新貌

趣味,赢得不少笑声与掌声。黄炎先个子较矮,很有表演才能。他唱的歌最高,表情到位,杨家岭机关不少人都熟悉他。黄炎先是黄立贵烈士的儿子,李富春、蔡畅两位前辈把照顾他及项英的子女等四名同学的责任担当起来。逢年过节时,必把他们接回来,视为自己的子女加以关照。

那次我们小学生给中央拜年,杨尚昆主任不仅发表讲话鼓励大家,并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还款待我们在杨家岭食堂吃了顿“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混合蒸的米饭)。在延安,大米实在太稀罕了,只是大生产运动以后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了一些低洼地,有了稻田之后才有了极珍贵的白米。当时平时吃的都是小米饭,顶多一周吃两次白面馒头改善伙食。最奢侈的就是吃顿“二米饭”,并戏称为“金米饭”,外加猪肉粉条,我们小学生秧歌队吃的那顿饭实在是享受到“最高级别待遇”了。

拜年讲究有来有往,农民群众向党中央拜年,李富春、陈毅等首长也曾代表党中央向杨家岭后山村群众回拜,并同村干部、每户一名群众代表一起吃团圆饭。由于我的继父王仲珊当时是民运代表,负责杨家岭机关和当地群众联系,因此我有机会跟他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团圆饭一般会摆十几桌,除了有群众自家做的菜、黄米糕和白馍以外,还有白酒和米酒。领导同志与大家有说有笑,其中尤以陈毅特别风趣幽默,善于开玩笑、拉家常,他摸摸英的子女等四名同学的脸蛋,拍拍青年们的肩膀……他们代表毛主席感谢杨家岭的乡亲们把前沟口让出来给中央机关办公,用行动支持党中央的工作,并且鼓励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争取做到“耕三余一”,以备荒年。团圆饭上中央首长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其乐融融。

父亲徐孝密已辞世15年了,当我重阅他的手迹及著述时,再一次走近了父亲,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对湖北省图书馆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和倾其所有的拳拳之心,女儿的思念与日俱增,仿佛清晰地看到父亲那亲切的身影与慈祥的目光,常常掩卷难以继续,并在追思中体验着藏在心底里历历在目的温馨。

父亲1926年12月30日出生于著名藏书之家,少年时代在私塾启蒙读书,15岁就读完了诗书、大小戴礼记、春秋左氏内外传以及《论语》、《孟子》、《孝经》等古籍。1941年从祖父徐行可专攻目录、校勘、版本、考据之学及史子百家、治学门径、授受师承,既不囿于古昔、又不拘泥于当世,博采诸家之学。因家富藏书,可谓中外古今兼收并蓄。

父亲于1951年到省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其间40年可用“爱书、爱馆、爱人”将记忆的片断连接起来。父亲看书常习惯在未看完的地方夹上书签,从不折页,在他看来,书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常用的书籍,父亲还会亲自用牛皮纸包好,并为我们书写工整的书名。每每看到书中值得研究的地方,他都会一一记录下来,因此父亲积累下来的卡片都是分门别类、书写工整的款目,他笑称“书皮学”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至今,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工作中要做有心人。”由于年轻时特定的学习背景,使得他非常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特别重视湖北省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提出省馆藏书结构的主要原则为“综合与特定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并用毕生精力致力于湖北省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体系。

父亲是著名目录版学家,对省馆的特藏文献尤为关注。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采访到一些名家的旧藏,经过亲自鉴定,抢救出明清善本近万册。根据他的意见,省馆先后投资百万余元,购进包括台湾影印古书刊在内的,总计数千种、上万册的历史文献,极大地充实了省馆历史文献特色馆藏。

每当省馆新进一名大学生,父亲都要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家庭、生活、学习等情况,鼓励他们从平凡工作做起,做事业的“有心人”,使“领导”与“群众”在谈笑风生中拉近了距离。他经常为馆内同志及武大、华师大研究生讲课,还极力支持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学习,并在时间和经费上给予保证。当初那些年轻同志如今也多成了业务骨干,回忆起来仍是记忆犹新,他被大家称为“良师益友”。

在工作实践中,父亲对中国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图书馆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业有专精、学有创见,有多篇文章发表,主编有多种著作,如主编或主持的专著有《湖北地方志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赠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录(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周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

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父亲提出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建设体

系,而最终徐家私藏也一并溶入了这个体系之中。我祖父徐行可,名恕,号谿謏,是近代大藏书家,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祖父1907年留学日本,次年奔丧回国,自此绝意仕途。祖父藏书之宗旨:“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自题其书斋曰“箕志斋”“藏楼斋”“知论物斋”“桐风斋”诸名等。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由觅书而藏书,与书结缘一生。“一生黄金散尽为收书”,故当代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咸谓《湖北地方志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赠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录(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周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

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父亲提出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建设体

系,而最终徐家私藏也一并溶入了这个体系之中。我祖父徐行可,名恕,号谿謏,是近代大藏书家,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祖父1907年留学日本,次年奔丧回国,自此绝意仕途。祖父藏书之宗旨:“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自题其书斋曰“箕志斋”“藏楼斋”“知论物斋”“桐风斋”诸名等。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由觅书而藏书,与书结缘一生。“一生黄金散尽为收书”,故当代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咸谓《湖北地方志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赠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录(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周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

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父亲提出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建设体

系,而最终徐家私藏也一并溶入了这个体系之中。我祖父徐行可,名恕,号谿謏,是近代大藏书家,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祖父1907年留学日本,次年奔丧回国,自此绝意仕途。祖父藏书之宗旨:“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自题其书斋曰“箕志斋”“藏楼斋”“知论物斋”“桐风斋”诸名等。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由觅书而藏书,与书结缘一生。“一生黄金散尽为收书”,故当代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咸谓《湖北地方志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赠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录(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周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

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父亲提出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建设体

系,而最终徐家私藏也一并溶入了这个体系之中。我祖父徐行可,名恕,号谿謏,是近代大藏书家,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祖父1907年留学日本,次年奔丧回国,自此绝意仕途。祖父藏书之宗旨:“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自题其书斋曰“箕志斋”“藏楼斋”“知论物斋”“桐风斋”诸名等。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由觅书而藏书,与书结缘一生。“一生黄金散尽为收书”,故当代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咸谓《湖北地方志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赠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录(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周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

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1943年至1946年,凡小学放假,我都回母亲在杨家岭机关的家居住,每逢元旦都能见到中央领导们互相拜年,并一同去给毛主席拜年。那时我年纪小,很好奇,放假没事就跑到出去玩。由于杨家岭的窑洞是一层层挖出来的,我在山坡下路边玩耍,很方便就能看到中央首长们拜年的情景。陈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通常由他先带领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出来拜年。中央组织部位于杨家岭沟口北山坡向阳的山腰间,他们从沟口北侧开始沿山坡小路由西向东走,途经中宣部领导老等人的住所,经过袁家臻、刘伯承、杨秀峰等领导住的窑洞——他们回延安准备参加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七大”,再往东至杨尚昆、王若飞的住处,下坡至王首道、任弼时住的窑洞(毛主席搬到枣园前的住处),最后拐一个弯向东按顺序到李富春、蔡畅、周恩来、邓颖超、贺龙、刘少奇、董老、吴老等领导住的窑洞(当时是一排外表用石头新砌的窑洞)。每到一窑洞前,主人必出来迎接,宾客互相拜年,然后窑洞主人跟随人群一同折返,向毛主席住地走去。参加拜年的队伍一开始只有三五个个人,边走边聚,中午有约30位同志聚在一起。人们知道毛主席习惯夜里工作,上午可能还在休息,此时给毛主席拜年最为合适。中央领导们给毛主席拜年,毛主席也向大家拜年,气氛十分热烈,场面甚为壮观。当时如无特殊原因,凡在杨家岭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各大部门的负责人均参加拜年活动。

等到春节的时候,杨家岭就更加热闹了。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留守部队都到杨家岭给党中央拜年。中央办公楼西侧有个院子,比篮球场略大,那里便成为各单位给中央领导拜年时的“专用场

1970年3月,像当年许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一样,姚雪垠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所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省的蒲圻县,工作主要是放牛和管理仓库,有时也参加农业劳动。姚雪垠在“干校”呆的时间并不很长,前后大约3年时光。但“干校”生活在姚雪垠的创作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艺术印痕,他写了近20首干校诗,大部分是在“干校”劳动期间写的,也有少数是对“干校”的回忆之作。今天重读姚雪垠的干校诗,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批干校诗内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五七干校”这场政治运动或历史事件究竟应该怎么看,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就会发现,姚雪垠在“文革”期间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是复杂的,具有二重性。这和“文革”结束以后,姚雪垠对“五七干校”持强烈的否定立场是不完全一样的。还是从他的《七律·赴五七干校》开始。

诗云:“老婆送我破晓天,行李扁担挂笑颜。到死方休填大海,有情不忘攀高山。白头渐似苏卿节,岁月原非邓氏钱。梦里据鞍人尚健,立功犹望趁衰年。”这是姚雪垠写下的第一首“干校诗”。首联明显洋溢着乐观的政治情怀,流露出姚雪垠当年对“干校”的政治认同立场。对于当时的姚雪垠来说,去“干校”劳动改造似乎并非一件苦差事,如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农村的天地非常广阔,知识分子文化人去农村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使命。正如他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所写:“四体常勤颇异骨,春郊田地落炊呼。络绎广道车千辆,掩映长堤柳万株。正遇寒潮迷雾雨,翻蒸热汗湿肌肤。挥锄我也逞豪兴,枯后诗情一叶苏。”但这种对“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

时已经是60岁的人了,要想完成《李自成》的创作宏愿,只能“立功犹望趁衰年”。虽然赴“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但作为脑力劳动的作家,姚雪垠在内心深处又感到深深的怀疑。如此看来,从一开始,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埋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种类型的干校诗,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类型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属于政治牧歌的干校诗主要有《羊楼洞初晴》、《忆羊楼洞旧街》、《响应》、《收早稻》、《冬至》、《放牧》、《放牧抒情》、《读报有感》、《春节放假还家》、《连队栽树万株》、《忆干校种菜》等等。这类诗作几乎被当时主流的革命情绪所鼓动,诗中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诗意描绘。读之恍惚间置身于古典田园诗境,而彻底一叶苏。”但这种对“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

时已经是60岁的人了,要想完成《李自成》的创作宏愿,只能“立功犹望趁衰年”。虽然赴“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但作为脑力劳动的作家,姚雪垠在内心深处又感到深深的怀疑。如此看来,从一开始,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埋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种类型的干校诗,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类型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属于政治牧歌的干校诗主要有《羊楼洞初晴》、《忆羊楼洞旧街》、《响应》、《收早稻》、《冬至》、《放牧》、《放牧抒情》、《读报有感》、《春节放假还家》、《连队栽树万株》、《忆干校种菜》等等。这类诗作几乎被当时主流的革命情绪所鼓动,诗中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诗意描绘。读之恍惚间置身于古典田园诗境,而彻底一叶苏。”但这种对“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

时已经是60岁的人了,要想完成《李自成》的创作宏愿,只能“立功犹望趁衰年”。虽然赴“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但作为脑力劳动的作家,姚雪垠在内心深处又感到深深的怀疑。如此看来,从一开始,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埋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种类型的干校诗,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类型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属于政治牧歌的干校诗主要有《羊楼洞初晴》、《忆羊楼洞旧街》、《响应》、《收早稻》、《冬至》、《放牧》、《放牧抒情》、《读报有感》、《春节放假还家》、《连队栽树万株》、《忆干校种菜》等等。这类诗作几乎被当时主流的革命情绪所鼓动,诗中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诗意描绘。读之恍惚间置身于古典田园诗境,而彻底一叶苏。”但这种对“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

关于姚雪垠的干校诗

李遇春



书斋中的姚雪垠

和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使我简直难分是非,不知所从。就以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来说,我心中认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十六条”就经不起推敲。所谓“扫四旧”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不敢流露半点怀疑思想,而且必须强迫我自己要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十六条”也条条是真理。‘百年方寸乱依违’一句诗,写的是我在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对于向来有棱角有个性且壮志不已的姚雪垠来说,在那个历史的暗夜里出现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他当时公开地质疑“文革”也不现实,毕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姚雪垠,只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很朴素地流露了对那个荒唐时代的不满。在第二首中,一句“空有泉灵埋地底”,表达了姚雪垠当时内心深处多少压抑和愤懑!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念:“何须感慨嗟头白,且看悬崖霜后花。”用“悬崖霜后花”这个意象来概括姚雪垠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简直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

相对而言,《感怀(二首)》的意旨更趋激烈。姚雪垠后来专门《感怀》写跋,交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和缘起。这首诗作于1972年2月,距离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久。当年林彪叛逃的事件传到了“五七干校”以后,人们难以置信,姚雪垠在小组会发言时引用了白居易的四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谁谁知?”没曾想,小组主持人认为姚雪垠的引诗大有问题:既然把林彪比作王莽,那么汉平帝是谁呢?认为有影射和诬蔑伟大领袖之嫌。于是在“干校”里对姚雪垠发动了一场声势严厉的批斗会。这两首诗即写于这次批斗会后的3个多月,

和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使我简直难分是非,不知所从。就以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来说,我心中认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十六条”就经不起推敲。所谓“扫四旧”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不敢流露半点怀疑思想,而且必须强迫我自己要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十六条”也条条是真理。‘百年方寸乱依违’一句诗,写的是我在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对于向来有棱角有个性且壮志不已的姚雪垠来说,在那个历史的暗夜里出现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他当时公开地质疑“文革”也不现实,毕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姚雪垠,只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很朴素地流露了对那个荒唐时代的不满。在第二首中,一句“空有泉灵埋地底”,表达了姚雪垠当时内心深处多少压抑和愤懑!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念:“何须感慨嗟头白,且看悬崖霜后花。”用“悬崖霜后花”这个意象来概括姚雪垠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简直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

相对而言,《感怀(二首)》的意旨更趋激烈。姚雪垠后来专门《感怀》写跋,交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和缘起。这首诗作于1972年2月,距离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久。当年林彪叛逃的事件传到了“五七干校”以后,人们难以置信,姚雪垠在小组会发言时引用了白居易的四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谁谁知?”没曾想,小组主持人认为姚雪垠的引诗大有问题:既然把林彪比作王莽,那么汉平帝是谁呢?认为有影射和诬蔑伟大领袖之嫌。于是在“干校”里对姚雪垠发动了一场声势严厉的批斗会。这两首诗即写于这次批斗会后的3个多月,

用划船将书全部抢运到汉口法租界,从而保护了存放在武昌旧居的这一部分古籍。不久,徐家在武昌旧居被日军炸毁。抗战胜利后,马一浮为其书斋题名“贞胜书斋”,既志绝处逢生的欢悦,又表其爱国的赤诚不二。在他晚年,马鬲更苦为其题:“得此书,贵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的横批,正是其一生集书、藏书艰辛的写照。

解放初期,董必武同志在北京接见湖北知名人士时,祖父曾表示了捐赠之意,“愿孤传种子化作千万身,惠及天下学人。”祖父曾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他常自谓:“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休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1956年将500箱私藏捐献中科院武汉分院。而后将祖父所赠藏珍贵古籍630多卷,补充赠书内容。

1959年祖父去世后,北京、上海古籍书店都纷纷前来高价访求其遗留古籍,我父亲徐孝密等兄弟姐妹“秉承其遗志,欲尽未遂之业,择选遗藏,公之国家。”父亲在促成祖父所赠藏珍贵古籍4万册、文物约7800件无偿捐赠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家提出的唯一要求即:编辑徐氏捐赠古籍、文物目录。后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1961年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徐氏藏书拨归省图书馆,至此,徐氏所藏10万册古籍终于合二为一归属省图书馆了。

祖父50年藏书籍数逾千,册10万。其中经部书籍为1.5万余册,史部为2.5万余册,子部为1.3万余册,史部为1.9万余册,丛部为2.1万余册,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其所藏善本有多部列入《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省馆第一批、第二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徐家捐赠亦占有一半。如:明代万历年间刊《黄鹤楼集》为海内仅存孤本;纪昀批点并跋《史通训故补》;黄侃手批《尔雅正名》等珍贵古籍。今省馆所藏5万古籍善本中约1/2为徐家捐赠。“徐氏藏书人的入藏,使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从量到质产生了飞跃”,为湖北省图书馆古籍文献藏量跻身于全国同行业的前列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藏书外,徐氏捐赠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作品也很多,总量计近7800余件,种类包括元、明、清字画,册页、扇面、手札、楹联以及甲骨、金石拓片、铜镜、瓦当、封泥、印章、历史碑帖拓本等,其中有汉代李氏龙虎镜、唐代《维摩诘经》卷、宋拓《澄清堂帖》、《麓山寺碑》、《云麓碑》、明代倪云璐巨幅山水画、“文姬出塞图”、王阳明绝笔行书手卷《良知》四绝、王铎草书《题野鹤陆舫齐》诗卷、清代王石谷、恽南田等名家画(轴)册,在省博物馆占有出土文物中徐氏捐赠的文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绘画最具有代表性。

私藏鉴印章是徐氏文物收藏中极有特色的一类。印章皆为祖父好友王福庵、唐醉石、韩登安、方介堪等名家所刻,共计200余方。“文革”期间,仅留作存念的篆刻印章被抄,“文革”后几经周折未果。这些藏品都极富收藏价值与艺术价值。

斗转星移,光阴在再,不知不觉我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了20多年。祖父、父母亲和我三代人与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密不可分,好像是天意使然。在先辈们的影响下,我经历了爱书、爱馆、敬业的过程,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有较丰富经验的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依恋图书馆的过程也是经历图书馆发展的过程,省图书馆是我生活与精神的家园。



徐家长年聘请高级工匠制作书柜,其制作精良,为当时业内人士称道,后大部分书柜捐赠湖北省图书馆。

斗转星移,光阴在再,不知不觉我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了20多年。祖父、父母亲和我三代人与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密不可分,好像是天意使然。在先辈们的影响下,我经历了爱书、爱馆、敬业的过程,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有较丰富经验的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依恋图书馆的过程也是经历图书馆发展的过程,省图书馆是我生活与精神的家园。

徐家长年聘请高级工匠制作书柜,其制作精良,为当时业内人士称道,后大部分书柜捐赠湖北省图书馆。